

# 师友印象



# 我所知道的范长江

## 从名记者到社会活动家

1939年全年，范长江同志一直在桂林度过。这一年，他对“文化城”桂林的繁荣昌盛作过卓越的贡献。这一年，他个人的经历也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他从一个单枪匹马的名记者成为一支新闻队伍的指挥员，一个忠诚于新闻教育的教育家，一位特别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1938年末，我作为国际新闻社的一个青年记者，随同长江从长沙来到桂林，同他一起度过国新社艰苦创业的一年。1940年初，我又随他到重庆工作。桂林一年间，长江给我的印象特深，至今记忆犹新。

### 肩挑社长重任

众所周知，长江原来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以写旅行通讯出名。他的通讯因为大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内容，强烈的逻辑性，富于政论色彩，别具一格。他第一个报道了当年中国人民希望所寄的红军长征和陕甘宁边区的新世界。这些通讯像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为现代我国记者写作的通讯中的杰作和珍

品。在抗战以前，他的这一类作品开创了我国新闻报道的一种成功的形式，当年《大公报》记者秋江、小方、邱溪映等都纷纷写作类似的通讯，满足了广大关心国事的报纸读者的需要。长江在武汉失守之前，还到过战地采访，写了报道台儿庄大捷的通讯。但是，这次从前线返回以后，他接受了创办国际新闻社的任务，他就不再单兵作战，没有再坚持写作他那种脍炙人口的通讯了。

我在长沙参加刚创办的国新社，初识长江同志，他身穿草绿色哗叽开领上衣，同色马裤，精神抖擞，仍然保持着一副战地记者的英姿。他那时也就30岁。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是一位老成持重的长者，身经百战的大将，他准能指挥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旗开得胜。

到桂林，国新社得道多助，工作发展得很快。长江得到号称“进步文化界的参谋长”的胡愈之同志的帮助，运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团结了活跃在全国新闻工作第一线的近百位进步记者，还吸收了十几位年轻人作为基本工作队伍，开始向海内外报纸发稿，成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广泛发稿的通讯社。长江承担了这个通讯社社长的重任。

老马识途，长江以他自己丰富的经验，辨识着在新形势下何时何地出新闻，能写出有何等份量的报道，他还知道什么题材由他手下的哪位同志去采访和写作更得心应手，或者能受到最需要的锻炼，提高得更快。

也就在长江同志的指挥之下，一批批年轻记者被派到了江西正面战场和敌后新四军营地去采访。我们小字辈中不少同志是异常勤奋的，出色地完成了写通讯的任务，工作能力提高得很快。长江同志在读到他们的习作时，曾多次对国新社的总编辑黄药眠大师赞扬说：“请你看看，这是多么好的报道，文章写得多漂亮，是一个人才，人才！”

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一批批通讯稿由这些年轻记者写

了寄回来，并在海内外报纸上显著地刊登出来，国新社创造了一个兴盛的局面。这时期，长江自己很少写稿，他的全部精力花在组织别人写稿上。国新社能及时地为海内外许多报纸提供成批反映抗战形势的报道，广大读者能在信息传播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读到一些正确、鲜明、生动的通讯，这都是长江领导和悉心经营的成果。

## 为了传帮带

培养人才需要教育，这一点，早在 1939 年长江同志就具有深刻的认识。

国新社在 1939 年初刚开始正常运转的时候，长江创办了一本进行自我教育的内部刊物，名叫《采访与写作》，发表长江自己、秋江、陆诒等老社员的经验和年轻记者们的心得体会。这本刊物供社员同志们学习，还寄给所有同国新社有联系的通讯员。它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刊物，因此特别富于指导实践的教育作用，为从事新闻采访的同业们所热爱。我有幸是这个刊物的基本读者和受益者，只是由于战时生活的颠沛流离，特别由于挨过轰炸，很遗憾，《采访与写作》这刊物连一页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令人高兴的是，当年桂林《大公报》的负责人王文彬同志对这本刊物爱不释手，一直珍藏了几十年。

为了传帮带，长江同志联合当时国新社其他前辈如秋江、邵宗汉、黄药眠等，为年轻的同事们写了一本《怎样进行新闻采访》的小册子。这是他们几位的经验总结。整个内容我已经不复记忆，但至今记得它写得很细，这是本非常实用的新闻学著作。但愿桂林图书馆还收藏着它。

同样为了传帮带，长江曾在国新社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新闻工作的一些学术问题。在这些会

上，他尽力鼓励年轻同志积极发言，提供新见解。

长江非常赞成教育家陶行知关于生活教育的思想，主张“即知即传人”。他竭力推动兴办新闻学刊物，传播有关的理论和经验。在他领导之下，“青记”联系的桂林几家主要报纸，都办起了新闻学副刊。《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扫荡报》都出过定期的副刊《新闻记者》。

长江十分重视接班人的培养。在国新社十分穷困的日子里，他也多方吸收了一些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人入社。这个做法曾使黄大师感到迷惑。长江向大师解释说：“你要沉得住气，我们今天虽是稿子的发行，将来是人的发行。”

果真不错，受过国新社和“青记”培养的一批有新观点、新气派的年轻人以后都成了党的许多宣传和新闻部门的骨干。

现在回想起来，早在 1939 年，认真提倡为人民的事业培养新闻人才的人是不多的，而在白区为此作过艰苦努力的就更少更少了。长江老师是少数人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是我们许多受益的后辈难忘的一个。

以后他到苏北，办过正式的新闻专科学校；在解放后的北京，又办过新闻学院，人才辈出。在新闻教育的事业上，他可以称得是劳苦功高的了。

## 还是社会活动家

当年在桂林接触过长江同志的人，至今还缅怀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影。

长江初到桂林，已经是个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竭力去完成党托付的各项任务。他在桂林，不仅负责国新社和“青记”的领导工作，还致力于联系各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明白地说，就是做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

长江有他名记者的社会基础，而且他阅历丰富，当过兵，听过大学的课，交游很广，一向善于同社会上各色人物交往。在人才荟萃的“文化城”，自然是大有作为的。

同胡愈老一样，长江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救国会的成员，他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到桂林不久，就受聘为广西省“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这个会实际上是桂系联系蒋介石嫡系以外社会力量的机构，桂系依靠它加强自己的地位。长江同志也因此同桂系以及当时在桂各派反蒋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

我记得，长江同志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如李四光、陶孟和等在桂林时就有了亲密的交往。很可能也就由于这一段因缘，解放后他的工作重点终于从文化界转移到科技界，当了很多年全国科协的副主任。

长江同志在桂林还承担着一部分国际的统战工作，他曾同朝鲜义勇队过往很密。义勇队的韩志成同志由他介绍成为国新社的社员。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一天，我在板门店采访，又遇见了这位朝鲜兄弟，他当时是一位外交官，还深情地怀念桂林时的生活，惦念着我们的社长同志。由此看来，长江在桂林播种的友谊多年后在国外还在开花。

长江出生于四川，从小有“摆龙门阵”的才能，他博览群书，见闻特广，因此他的谈话一向生动活泼，富有魅力。在桂林当年，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演说家。

在“青记”和我们国新社的会上，他常常要讲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上也同样起着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桂林当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也真起过好作用。它办过时事讲座，请的大多是有号召力的进步人士，长江同志就是他们常请的一个。记得他曾经讲过一次桂南边境十万大山的抗日战役，把我

军“关门打虎”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人，听者不禁为之动容，掌声不绝。

在桂林的一年间，他由于同群众有了广泛的接触，每天会客谈话的工作很重。在办公室要批阅很多熟人和生人的来信，还要给他们写回信，幸亏他年富力强，也还注意锻炼，能抽时间打球、到漓江里游泳，精力始终是充沛的。

当年和长江同志相熟的一些朋友都曾建议，长江这么忙，该有个贤内助。可是他对于解决恋爱与婚姻的问题十分慎重。他对我们说过，找爱人要找志同道合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结合才是最理想的。1939年，他没有落实对象，一直到1940年在重庆才和沈谱同志结婚。

据胡愈之同志回忆，长江同志也就在1939年被吸收入党的。胡老说，长江成了“毛泽东麾下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一名小兵”。回顾长江一生的事迹，胡老的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在我们一些同志中，曾经有人认为长江在武汉战役以后没有像“三S”那样坚持写作，报道我国伟大的变革，是可惜的，他没有充分发挥他的长才。但是，我认为，长江同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结合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作了很大的努力。1939年在桂林的一年就是一个例证，这一年是他飞跃的一年。

(1984年8月4日)

# 难得的新闻事业家

长江同志，不仅是个名记者，而且是个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已的新闻事业家。

## 一个新闻事业家的由来

长江于 1933 年 3 月开始新闻工作，为当时天津一些报纸写稿，一年之后任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和战地记者，历时 5 年。1938 年冬他接受党安排的创建国际新闻社的任务，学习党的许多理论著作，按党的教导办事，1939 年，他入了党，成为党的一名忠诚战士，他的新闻实践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主要的工作已不再是自己从事新闻采访和写作，而是创办新的新闻事业单位，领导与培养一批人从事新闻工作，他本人就逐渐成为一个为党和人民创办新闻事业的专家。到 1941 年，国际新闻社国统区的机构被封闭之后，他到香港开办《华商报》，担任副经理，以后他到苏北办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以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6 年 5 月国共和谈时，他在南京担任过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

解放战争时期，他一度担任新华社的负责人，并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向全国发布战讯和党中央的声音。

全国解放之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社社

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担任国务院文教系统的领导工作，还兼管一些新闻工作，一直到1956年调任科技部门的领导工作，才完全脱离了新闻界。

从1938年到1956年，足足有18年的时间，他为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实践，作出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开拓新闻工作领域的贡献，培养新闻工作干部的贡献。

这些贡献不像他当年写通讯那样为人们所知道，但是同样是切切实实的贡献，他大办新闻事业的实践，使他在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作为新闻事业家的记录。

就经验来说，他既有国内工作的经验，又有海外工作的经验；既有国统区的经验，又有解放区的经验；既有解放前办报的经验，又有新中国的经验；他不仅有当记者、编辑的经验，还有经营管理的经验，而且他高瞻远瞩，既胸怀全国，又眼望世界。党内外有几个这样的新闻事业家呢？很少，很少，多难得啊！

很可惜，他没有像名记者邹韬奋那样写下一本回忆录《经历》，他没有来得及写下他全部新闻实践的总结。在长江从事新闻工作的20多年中间，特别是建国初期的一段，新闻事业比较开放，报纸讲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党还帮助民主党派开办机关报，重视民意的反映。长江同志这时正经管全国主要的新闻机构，掌握了领导全国新闻事业的经验。他发表过一些自己的主张和感受，是很值得我们目前进行新闻改革参考的。很可惜，他在20多年前被迫害致死了，这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大损失，无可补偿的损失。

## 新闻事业家长江的特点

这几年，我有条件重读一些长江留下的通讯和有关新闻事业的文章，也回忆了自己追随长江同志学艺时的经历，深感不仅长

江同志的通讯值得研究与再学习，他开拓新闻事业的实践，他关于发展我国新闻事业的理论都值得研究与学习。

我这里要着重谈的是，长江作为一个新闻事业家的成就。我以为他的成就在新闻史上超过了旧社会所有的新闻事业家。长江的影响与作用也显然和他们不尽相同。

我觉得新闻事业家范长江具有下列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 他具有为人民办新闻事业的抱负。

长江是同《大公报》老板们决裂之后走上新闻事业家的道路的。1938年长江同志写了一篇题为《抗战中的党派问题》的文章，反对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宣传，《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拒绝发表，而且要求长江改变态度，作为继续在《大公报》工作的条件。长江因此同胡政之他们冲突起来，终于脱离了《大公报》。长江已经过5年的新闻实践，他深深感到新闻工作的重要，痛感记者没有自己的新闻机构，不可能如愿地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人民服务，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自由。因此他热心拥护当时致力于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与解放的中国共产党。

这时如果他没有这种觉悟，没有这种新闻事业心，他只求当个名记者，他可以在《大公报》委曲求全，也可以跳到任何一家后方报纸，依然可以得到重视，得到优待，仍然以名记者的身份，活跃于社会，但是，不，他要亲手创办自己的新闻事业。

因此，当同年周恩来同志指示他创办国际新闻社时，他就不顾一切艰苦困难，不再依靠老板，自己创办全新的新闻事业。国新社是他创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他当时就有这样的思想：“我们这些青年的新闻从业员对于新闻工作是想把它作为事业，不只是一个职业。事业是公共的比较永久地为之服务的，职业只是个

人一时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sup>①</sup>

他认为创办国新社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设想，事情必须而且可能这么办，因为他认为：“1. 抗战迫切要求进步的新闻事业；2. 抗战锻炼并提高了中国广大新闻记者的认识和能力，他们要求合理的新闻事业的产生。”<sup>②</sup>

从他有关国新社的设想中，就可以看到他经营新闻事业的雄心壮志。长江同志宣布过国新社有三大信条：就新闻岗位为新中国之实现而战斗；促进新闻事业之改革，以生产合作社方式，谋全体社员之福利。<sup>③</sup>

长江在国新社办了两年多的时候，就想得更远，他设想这个新事业的远景是很光明的，因为：“国内各地方的新闻事业有待发展；海外华侨的新闻事业的力量十分薄弱，需要支持；世界各弱小民族的新闻事业可以发展互相合作；国际公正舆论与中国之间可以发展互相交往。”<sup>④</sup>这是长江经营新闻事业的高级纲领。他当时要求国新社的同志们一点点地向着这个方向走去。国新社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但是长江为人民发展新闻事业的意志更加坚定。1941年《华商报》在香港创立时，长江为了熟悉报纸的经营管理，他担任了报社的副经理，这也体现着他一定要为人民办好中国的新闻事业的雄心壮志。

一个新闻事业家就是以这样的宏大抱负与切实步骤起步的。

（二）长江作为新闻事业家，非常重视民主办报，他主张新闻事业需要群众自己来参与。

长江受过老板的压制，他对于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报纸，

见长江所作《“国新”两年》第一节。

② 见长江所作《“国新”两年》第三节。

见长江所作《“国新”两年》第四节。

见长江所作《“国新”两年》第五节。

受少数人操纵的报纸非常反感，因此他渴望经营一种为群众服务、有群众参与的新闻事业。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感觉到新闻事业已经出现一种趋势，他称之为“从寡头新闻到大众新闻”，他说过：“为大众所爱戴的报纸，必定是反映大众生活意识，而且是指导大众生活的报纸，只有大众生活的内容是真实的，充实的，有血、有肉的，而且只有以大众生活为指导对象的报纸才能吸收无数敢于在艰苦环境中战斗前进的青年新闻记者。”<sup>①</sup>

在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946年，长江在新四军华中地区领导新闻工作，他提出了“大家办报”的主张，他认为“把办报工作只限制在报社内外的少数专业人员办报写稿，不发动广大读者群众大家动手，这等于闭门办报，一定不能与其他工作相结合，一定脱离群众”。“也只有广大的读者、群众，大家为报纸写稿，报纸才能办好。”<sup>②</sup>

1961年，我们国家已经经过了长官意志瞎指挥的阶段，长江同志已经脱离了新闻工作的岗位，他深感报纸脱离群众的危害。他当时就大胆地说过：“我们的报纸首先应该面向群众。一张报纸，在大的方针、路线原则上，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但具体的报道就要考虑群众的需要。报纸不能仅仅考虑地方党委的反映，也要考虑广大群众的反映。”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他还说，“做新闻工作，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加密切起来。”<sup>③</sup>

他还说：“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

见长江所作《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第二节。

见长江所作《关于新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见长江所作《记者工作随想》第二节。

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会心中有数，不致于像赌钱一样，跟着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他发表这些新闻事业“基础在群众，前途在群众”的主张是在1961年，他敢于这么说，说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事业家，是非常难得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同旧社会那些新闻事业家不是显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吗？

（三）长江作为新闻事业家，最重视人才，因此他在主持新闻机构时，悉心培养年轻干部，同时还认真团结一切可用的人才。

早在1938年他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与国新社时，就着眼于团结和培养一批为新闻事业的改进而积极努力的记者。以后在解放区他办过新闻学校，解放后在上海、北京又办过新闻学校，一直认真贯彻他的教育思想。

今天和过去50年间，新闻以及文化战线上起到过一些积极作用的同志中很多人都受过长江亲自的栽培，得到过他的帮助。

他所以那么认真培养干部和广结人缘，是由于他相信群众，他认为新闻事业是个集体性事业，最需要德才兼备的人。1959年他在北京主持培养新闻干部的北京新闻学校时，提出了新闻事业干部培养的新的方针，不要采取思想改造为主、业务为辅的传统方针，而要采取理论与业务并重的方针。他认为，采用前一种方针很浪费，因为自从党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宣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比过去复杂千百倍，这要求新闻干部既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知识，还要有较深的修养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培养出这样的干部来从事新闻事业才能起较大的作用。<sup>①</sup>

长江还认为：搞好新闻事业更需要坚持真理的干部，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要敢于说真

见长江所作《这一期的教学重心应当是什么？》。

话。我以为，这是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重要素养，是德才兼备中的德。

早在 1953 年他就说过：“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最勇敢的作风。最勇敢的人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的复杂、曲折道路而前进的人。真正的英雄是平凡而实际的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迷信于什么天才、神仙，和那种似乎是万能的圣人。”<sup>①</sup>

1959 年 7 月 21 日，长江在追悼韬奋时又一次表达了他的新闻干部要坚持真理的观点：“我们现在比韬奋同志所处的时代当然幸福得多，但是，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建设工作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sup>②</sup>

长江同志关于新闻事业的宏观见解显然不同于解放前一些新闻事业家。他比他们更多想着为人民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这是因为他像韬奋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他在新闻事业上，认真坚持着它。马克思主义使他具有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他主要的党性。没有科学的世界观而只知道纪律性，只知道奉行教条，那就不是完整的党性。长江同志是一个逐步具有完备的党性的新闻事业家，他是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新闻实践中诞生的新闻事业家，他的主张和理论无疑是从实践中来，并且经过他自己的成就验证过的，是我们今天很值得重视的。

见长江所作《祖国正青春》第四节。

见长江纪念韬奋同志逝世 15 周年时所作《为真理而奋斗》。

## 新闻事业家长江的不幸和当前的改革

按说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后，国家的经济应该蓬勃发展，政治上也将稳步走向民主，人民群众更多参加国家的管理，国家大事需要更多地让人民群众都知道，新闻事业需要有更加健康的发展，长江一辈有理想、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如鱼得水，大展宏图了。但是，历史确实不像长安大街那么平坦与笔直。众所周知，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走了一个“之”字，走了大弯路。同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相一致，新闻事业也高度集中化，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民意得不到正常的反映。这种情况同长江同志的新闻思想是十分矛盾的。上面引的部分长江的言论正是他针砭时弊的由衷之言。

看来 1956 年他的脱离新闻岗位，脱离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不仅仅是工作的调动，而是因为他的抱负一时已无法在新闻界实现了。他的离开新闻事业是一个不幸。

随着左倾思潮的进一步泛滥，1966 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长江同志终于在这次政治悲剧中被迫害致死了。从他在 1968 年年末所写关于国新社的交待材料来看，他的新闻工作的经历也在被审讯之列，而他表现了临难不苟、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对国新社的史实秉笔直书，没有说一句违心之论。他在回顾当年国新社工作同志的时候，没有略去一个已在极左的整人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长江同志这种正直的风格，令人肃然起敬。

苏联有一个杰出的宣传家、理论家、新闻事业家，他的名字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他曾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辑，他就由于坚持和斯大林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包括言论与新闻自由的主张，而终于惨遭杀害，一直到 50 年后的今年

才得到平反。

我们党过去在整党和肃反方面有过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偏向，长江和许多中国杰出的政治人物遭到和布哈林类似或近似的命运是毫不奇怪的。

西方有句谚语：“一个智者的去世，就好比倒下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长江这位名记者与新闻事业家的过早去世，在当今我国好比倒掉了一个电视中心大楼一般，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极大的损失。

当前我们怀念长江、研究长江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振兴中国新闻事业，促进四化，振兴中华。希望从长江的事迹中、遗言中、著作中，吸取得能有助于新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我个人对长江同志了解不多，但我以为，长江的关于办人民新闻事业的理想，他的关于民主办报的主张，他的关于培养新闻人才的方针，以及他关于新闻工作者实事求是与说真话的见解，都是十分有用的，应该在改革中争取让它们得到充分的贯彻。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点，时代在前进，但困难不可免，在新闻改革中特别需要有志之士像长江那样进行“大胆的试验”，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我已是新闻界的一个老弱残兵，但仍愿与同志们共勉。

（1989年5月10日）

（原载长江纪念文集《不尽长江滚滚来》）